

日治台灣政治面向的設計

撰文／林磐聳

設計政治學

前文〈台灣設計的歷史脈絡〉（參閱《藝術家》587期）以店鋪標章探討1895年之前明清時期、1895至1945年日治時期、1949年國民政府來台之後三個

階段的设计發展，三種政治治理之下的设计形式具有明顯的風格差異：明清時期講究師徒制薪火相傳，重視人工手作的訓練方式，專注於詩、書、畫、印的版印藝術，形成側重傳統文化的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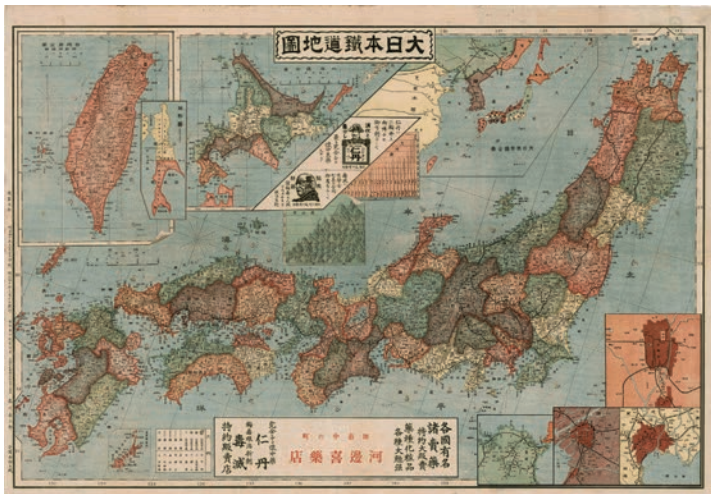
術取向之表現形式；日治時期則接受西方理性製圖方式開創現代设计面貌，建立有利於管理規範並強調功能取向的標準化设计方法；國民政府來台後既有延續日本吸收國際的現代设计，也有來



石川寅治所作的明信片〈臺灣鎮定〉，描繪1895年6月11日日本征台統帥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領部隊騎馬進入台北城北門的景象，部隊穿著的禮服可與大阪每日新聞社發行的〈帝國服制要覽〉相互對照。1917年石川寅治接受台灣總督府委託，創作具有歷史意義的300×270cm大尺幅油彩畫作〈臺灣鎮定〉，現藏於1926年於東京明治神宮外苑開設的聖德繪畫紀念館。（圖版提供：林磐聳）

右。佐藤保太郎監修、中央地圖研究所製圖、原一司繪製 大東亞共榮地圖 1941 《少年俱樂部》第28卷第1號附錄（圖版提供：林磐聳）

〈大東亞共榮地圖〉以精準的地理疆域搭配在地物產及工作人員漫畫圖象，達到少年讀者群的教育功能。下方的「留在日本人數」，分別列舉滿洲國157萬8497人、北支那18萬9162人、中支那9萬4960人、蒙疆地方約4萬人、菲律賓2萬5269人、南支那2萬1611人、蘭領印度6469人、英領馬來5908人、英領婆羅洲1494人、英領印度1400人、泰國522人、佛領印度支那234人，具有推動日本國民認識大東亞共榮圈的政治意圖。



1907年由森下博藥房印製發行，提供仁丹與毒滅特約販賣店廣告行銷的〈大日本鐵道地圖〉。台灣在此幅地圖已經歸屬日本的紅色版圖內，上面更有台灣縱貫鐵路沿線車站；地圖做為昭告世人其政治管轄所屬的領土疆域，再搭配仁丹藥品廣告在各地的行銷推廣而深入人心，可謂是設計政治學的經典。（圖版提供：林磐鋒）



1908年台灣總督府發行的台灣縱貫鐵路開通紀念明信片。此枚明信片中有當年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1844-1915，左上）、民政長官後藤新平（1857-1929）肖像，中間則是彩色繪畫冒著白煙、全速前進的火車急駛穿過全長889公尺的台灣第一鐵橋「濁水溪鐵橋」；郵戳以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徽章做為內圈，外圍加上「臺灣縱貫鐵道全通紀念」字樣。（圖版提供：林磐鋒）

自上海廣告的折衷式風格，加上日後美援時期挹注西方現代思潮的設計新風尚，展現出兼容並蓄與多元發展的設計風貌。然而這三個歷經不同政治型態治理的設計發展階段，明顯受到頂層階級政治意圖的上位指引，形成不同的設計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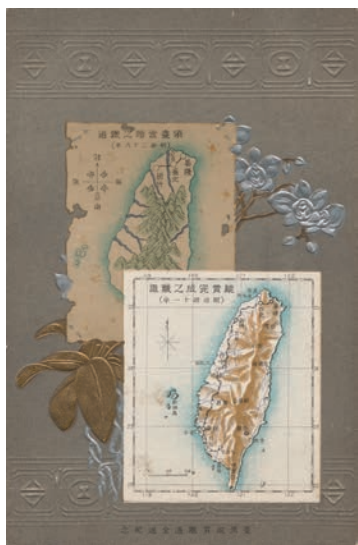
設計是具有功能導向

的實用藝術，直接受到宏觀經濟分析模型理論「PEST」：政治（Political）、經濟（Economic）、社會（Social）、技術（Technology）四個面向影響，其中又以政治治理與設計表現息息相關。如同過往大家所探討的經濟政治學、運動政治學、

藝術政治學的依存關係，政治總是凌駕各種專業之上，透過政策、傳播、金錢等不同手段達成其目的。2016年荷蘭設計師魯本·派特（Ruben Pater）著作《設計政治學》，他以人類學及社會學的觀點分析日常設計活動與視覺圖象背後的政治意涵和價值取向，發現日常生活設計其實受到政治深遠的影響。

《設計政治學》曾獲選美國平面設計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Graphic Arts, AIGA）終身成就獎、藝術指導俱樂部（Art Directors Club, ADC）名人堂，為《紐約時報》撰寫書評的設計評論家史蒂芬·海勒（Steven Heller, 1950-）譽為21世紀的經典名著，甚至可媲美引領現代傳播發展極為深遠的馬歇爾·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 1991-1980）名著《媒體即訊息》；該書翻轉過往大家只重視設計表現的功能性或是形式風格的藝術性，提出深入探討頂層階級的政治意圖與設計表現之間的互動關係。1895年日本在台灣建立第一個殖民地且治理歷程長達五十年，當年由上而下展現施政措施的經濟、社會、技術、文化、教育、藝術、設計等，必然都是政治考量的執行面，因此日治台灣政治面向的設計有其獨特的時代容顏。

《蒙特維多國家權利義務公約》（Montevideo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是1933年12月26日第七屆美洲國家國際會



1908年台灣總督府發行3枚明信片大肆慶祝、宣傳、紀念台灣縱貫鐵路開通。此枚明信片特別將2幅新舊台灣地圖並列比較，後方較為古拙殘破的老地圖寫著「領臺當時之鐵道（明治二十八年）」，僅有基隆至台北、新竹3站；前景則是「縱貫完成之鐵道（明治四十一年）」，清楚標示著台灣西部從北部基隆延伸至南部打狗、九曲堂，建置起今日台灣縱貫鐵路的線路及車站；從1895年領台至1908年，短短13年的時間便連通台灣西部的交通動脈。背景襯以金銀2色印刷打凸的金葉銀花蝴蝶蘭，上下2行以台灣總督府的台字章及鐵道徽章打凸的特殊工藝讓整體視覺效果極為典雅尊貴。（圖版提供：林鬱馨）

右。1908年台灣總督府發行的台灣縱貫鐵路開通紀念明信片。此枚明信片以〈臺北停車場〉、〈臺灣神社〉、〈內社川鐵橋〉、〈打狗港〉4張照片組合而成，中間加入1張寫著「自基隆至打狗二百四十七哩全通紀念」的紅紙，背景有台灣西部及南部盛產的農作物香蕉，以及備受日本皇室與貴族喜愛，同時也做為日本皇室家徽的菊花，由此可見在明信片方寸之間具有的政治意涵。（圖版提供：林鬱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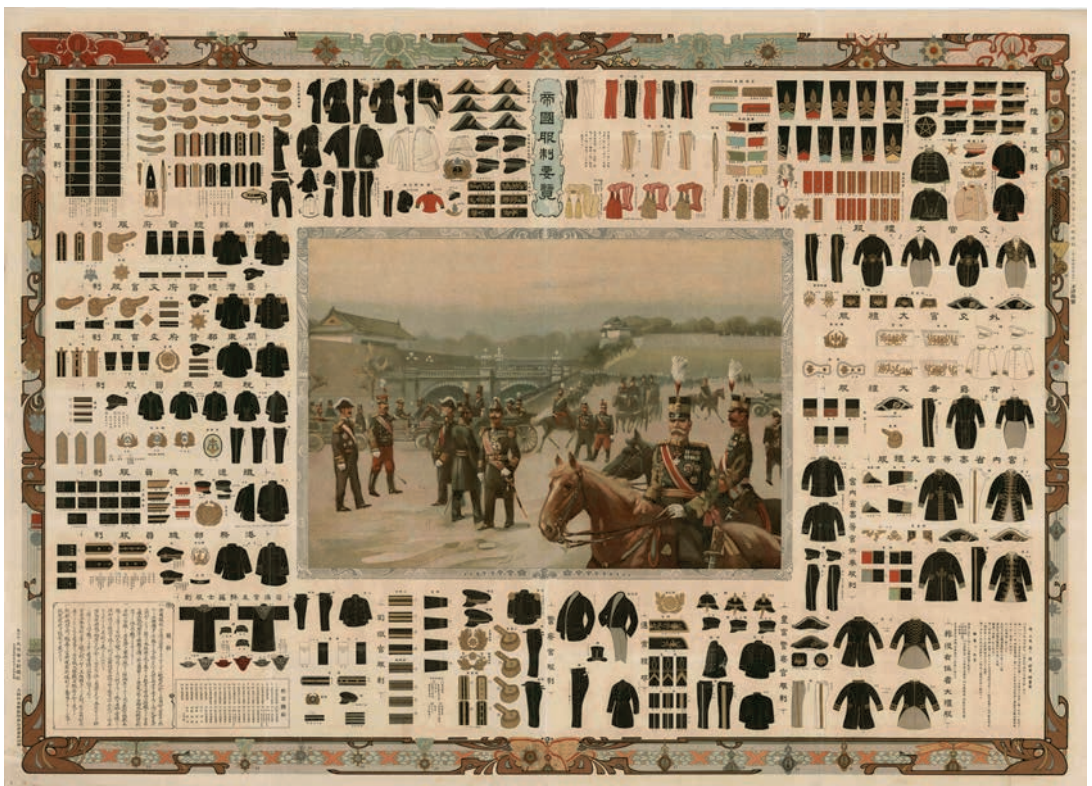
議於烏拉圭首都蒙特維多簽署的一項國際公約，其中有關建國聲明的內容已經成為《國際習慣法》的重要部分。該公約第一條指出「國家做為國際法人應具備以下的資格：常住的人口、界定的領土、有效統治的政府、與他國建立關係的能力」，其中「領土」是國家行使主權、執行法律、具有統治管理的範圍。1895年中日簽署《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澎湖給日本，為了展現日本對於台灣擁有的治理權力，往往透過地圖的圖象形式來標誌疆界範圍。本專欄於〈台灣設計的主體性〉（參閱《藝術家》581期）介紹了吉田初三郎（1884-1955）來台繪製的多幅台灣全島或各地鳥瞰圖，顯現出地圖具有的政治象徵性，以及其鳥瞰全景獨特的藝術性。

地圖與廣告的設計

1893年廣島出身的森下博（1869-1943）在大阪開設「森下南陽堂」，從事藥物原料批發。1894年中日爆發甲午戰爭，隔年簽訂《馬關條約》，清廷將台灣割讓日本。日本治台之初鼓勵各種職業的民間人士前往台灣，森下博因此隨軍來台，發現居民習慣在口中含著清涼保健的丹丸，返回日本之後開始研發類似的保健藥品，於1905年推出顆粒狀的懷中良藥「仁丹」。之所以取名有「丹」字，與其當年台灣之行眼見台灣人將服用藥丸取名「藥丹」、「仙丹」、「靈丹」的經驗有關。仁丹同時在台灣的新聞紙刊載大量廣告，經典的品牌商標是一位穿著禮服、戴著禮帽的翹鬚子人物，森下博曾說這不是軍人而是外

交官的形象，因為「仁丹正是藥的外交官」。因此仁丹不只在日本、台灣販售，還銷售到中國、東南亞、印度、美洲等地，成為無所不靈的萬靈藥，更被譽為「日本的阿斯匹林」，在日本也被以相同的日語發音誇張地稱作「神丹」。

1907年，改名後的「森下博藥房」發行54.5×78.5公分的〈大日本鐵道地圖〉，是因應日本人搭乘鐵路商務、觀光、旅行所需要參考的用品，做為家庭常備或海報張貼使用來達成推廣宣傳的目的。除了以彩色地圖標示國家、區域及日本海外殖民地之外，上面可見以黑色印製公版的仁丹及毒滅（梅毒藥品）商標圖案，以及「各國有名諸賣藥，特約大販賣，藥種化粧品，各種大勉強」等廣告宣傳文案，另外再以紅色套印特約販賣店名稱，如



帝國服制要覽 1911 彩色印刷 76.6×109.2cm 大阪每日新聞社發行 (圖版提供：林磐聳)

〈帝國服制要覽〉既做為大型海報張貼閱覽，更是教育民眾、使國民週知的傳播工具。圖中所列舉的不同階層、大大小小的服飾配件，以及日本內地與殖民地的相應規範，展現鉅細靡遺的精心規畫，明顯受到歐洲皇室、政府及軍方服制系統管理的思維影響，建構起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帝國的外在視覺形象。



〈帝國服制要覽〉局部：台灣總督府文官服制。從肩章、袖章、袖扣都可以看到上下2個三角形組成的標章符號，此與台灣總督府1899年《府報》第475號公告的肩章、袖章圖樣，以及1920年《府報》第2095號公告的〈文官服制改正〉帽徽圖相同，由上下2個三角形組成的標章符號成為象徵台灣總督府的台字章。(圖版提供：林磐聳)

「堺市中の町，河邊喜藥店」，成為通行全國各地的行銷廣告。更重要的是，此幅地圖已經將台灣標示為日本所有的紅色版圖，但是韓國（當年稱朝鮮）1910年才成為日本殖民地，所以在此地圖上還是以灰色標註。由此可知，地圖被用來昭告世人其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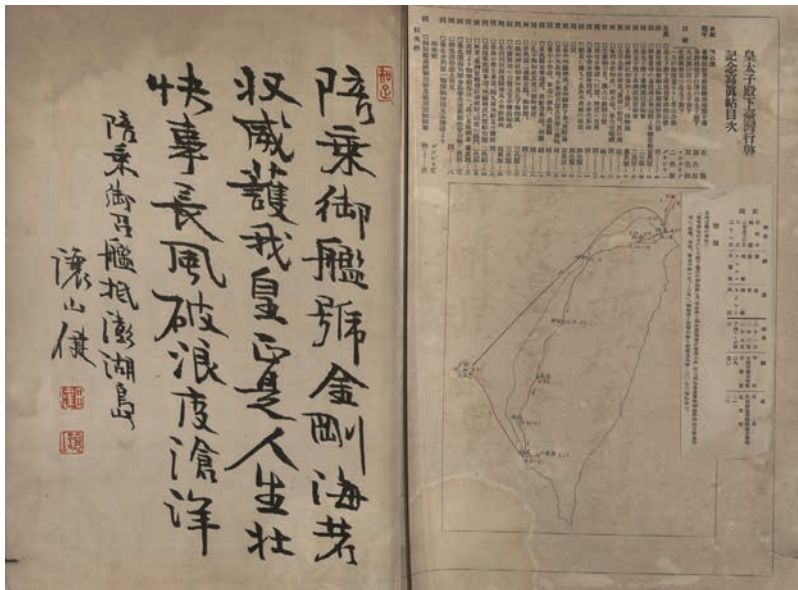
管轄所屬的領土疆域，再加上藥品廣告在各地行銷推廣而深入人心，可謂是設計政治學的經典。

〈大日本鐵道地圖〉左上角「台灣島全圖附澎湖諸島」圖面，清楚標記從基隆至打狗（高雄）的台灣縱貫鐵路沿線各站基本上已經設置完成，四周還有

三艘揚帆航行的小船，帆面上寫著「仁丹」字樣。明治41年（1908）台灣總督府發行三枚繪葉書（エハガキ，明信片），大肆慶祝、宣傳、紀念台灣縱貫鐵路開通。其中一枚明信片特別將兩幅新舊台灣地圖並列比較，背景襯以金、銀兩色印刷打凸的



太田猛編輯 皇太子殿下臺灣行啟記念寫真帖 1923年6月13日 彩色印刷 38.5×26.5cm 台南新報社發行 (圖版提供：小松孝英)
 《皇太子殿下臺灣行啟記念寫真帖》封面以裕仁親王照片做為主題，右方有高聳的檳榔樹與左下方的鳳梨對角呼應，展現南國台灣特有的景物。
 右。《皇太子殿下臺灣行啟記念寫真帖》目次旁頁有時任台灣總督田健治郎親筆書寫的七言絕句：「陪乘御艦號金剛，海若收威護我皇；正是人生壯快事，長風破浪度滄洋。」落款：「陪乘御召艦抵澎湖島，讓山健。」鈐印：知足、田健、讓山。此為田健治郎伴隨裕仁親王搭乘金剛艦前往澎湖所記。(圖版提供：小松孝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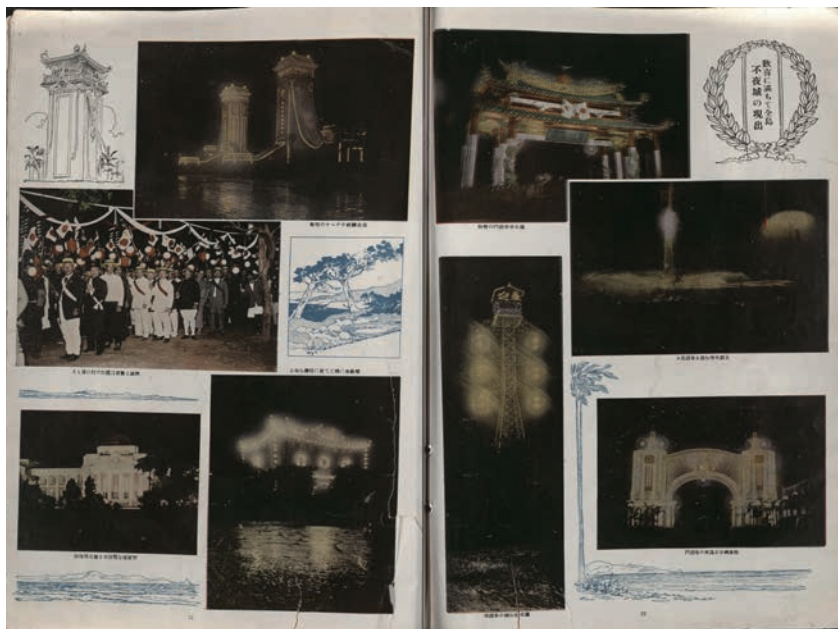
金葉銀花蝴蝶蘭，上下兩行以台灣總督府的台字章及鐵道徽章打凸的特殊工藝讓整體視覺效果極為典雅尊貴。位於後方較為古拙殘破的老地圖寫著「領臺當時之鐵道（明治二十八年）」，僅有基隆至台北、新竹三站；前景則是「縱貫完成之鐵道（明治四十一年）」，清楚標示著台灣西部從北部基隆延伸至南部打狗、九曲堂，建置起今日台灣縱貫鐵路的線路及車站；從1895年領台至1908年，短短十三年的時間便連通台灣西部的交通動脈。另外一枚明信片則是以〈臺北停車場〉、〈臺灣神社〉、〈內社川鐵橋〉、〈打狗港〉四張照片組合而成，中間加入一張寫著「自基隆至打狗二百四十七哩全通紀念」的紅紙，背景有台

灣西部及南部盛產的農作物香蕉，以及備受日本皇室與貴族喜愛，同時也做為日本皇室家徽的菊花，由此可見在明信片方寸之間具有的政治意涵。

日本帝國服制系統

前面提到仁丹商標頭戴大禮帽與穿著禮服的形象，與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學習西方列強現代文明及管理方法有關。日本勤奮學習科學文明、引進科學技術，朝向富國強兵的國家發展目標，隨著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打敗大清帝國及沙皇俄國，躍升為亞洲的強權國家。為了促進國家維新所建立的軍隊、文官、警察、司法等制度，必須建置一套完整的服制系統，使得人民得以了解各種服裝及勳章代表的意義。

明治44年（1911）大阪每日新聞社發行隨報派送的〈帝國服制要覽〉，是76.6×109.2公分的大型彩色印刷品，可以做為海報張貼閱覽，更是教育民眾、使國民週知的傳播工具。從大勳位菊花章頸飾、大勳位菊花章大綬飾、大勳位菊花章、勳一等旭日桐花大綬章、勳一等旭日桐花大綬章副章、勳一等旭日大綬章、勳二等旭日重光章、勳三等旭日中綬章、勳四等旭日小綬章至黃授章，總計有四十一種勳章以銀色及彩色套印、編排在框緣；自右上而下至左上，依序刊載說明了陸軍服制、文官大禮服、外交官大禮服、有爵者大禮服、宮內省高等官大禮服、宮內省高等官供奉服制、非役有位者大禮服、皇宮警察官服制、通常禮服、警



《皇太子殿下臺灣行啟紀念寫真帖》第12頁、第13頁以「全島充滿歡喜所出現的不夜城」為題，有〈臺北市奉迎門電飾〉、〈五彩天空與奉迎煙火〉、〈電飾輝映的高雄奉迎門〉、〈臺北市公園奉迎塔〉、〈臺北車站前的拱門電飾〉、〈不夜城出現的臺北博物館〉、〈熱情歡迎的提燈籠居民〉等圖並搭配手繪插圖，說明為迎接皇太子蒞臨，台灣各地精心設計、投入城市的裝飾布置。（圖版提供：小松孝英）
右。台灣總督府發行的《大正十二年四月皇太子殿下行啟紀念繪葉書》，封套以紫色反白的椰子樹剪影象徵台灣南國獨具特色的產物，搭配燙金的菊之御紋，整體簡約素雅又深具南國風味。（圖版提供：林懿馨）

察官服制、司獄官服制、司法官及辯護士服制、港務部職員服制、鐵道院職員服制、稅官職員服制、關東都督府文官服制、台灣總督府文官服制、朝鮮總督府服制及海軍服制。其中在台灣總督府文官服制的肩章、袖章和袖扣可以看到上下兩個三角形組成的標章符號，與1920年台灣總督府《府報》所公告的台字章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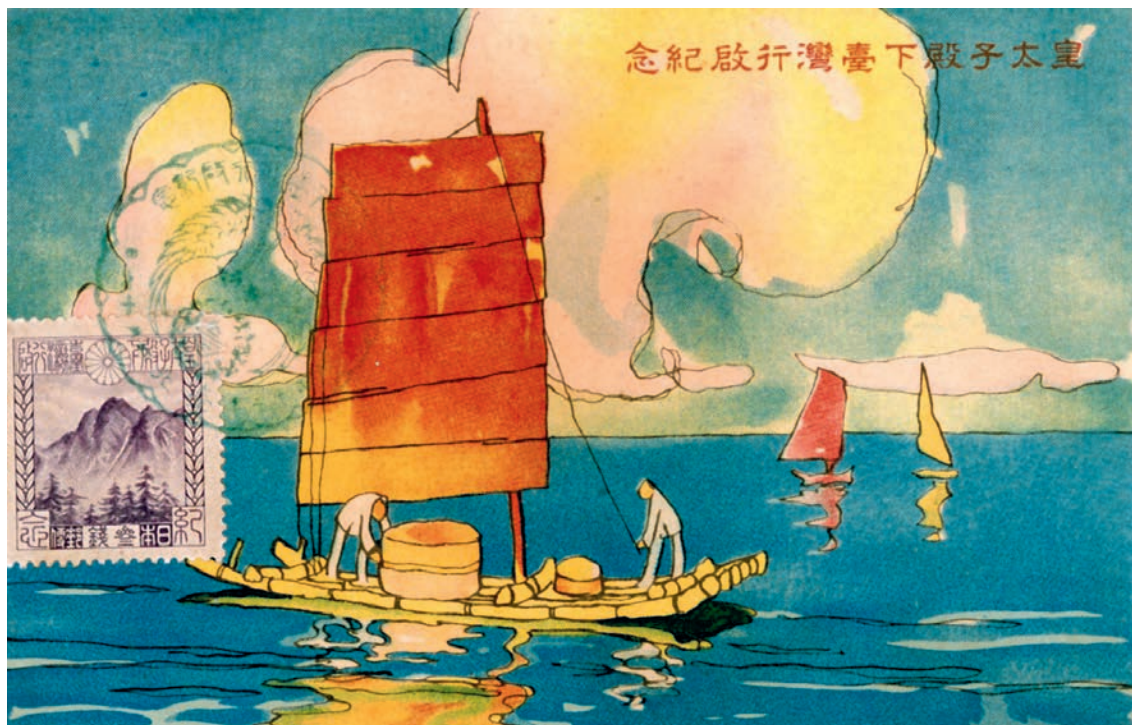
〈帝國服制要覽〉中列舉的不同階層、大大小小的服飾配件，以及日本內地與殖民地的相應規範，展現鉅細靡遺的精心規畫，明顯受到歐洲皇室、政府及軍方服制系統管理的思維影響，建構起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帝國的外在視覺形象。

皇太子台灣行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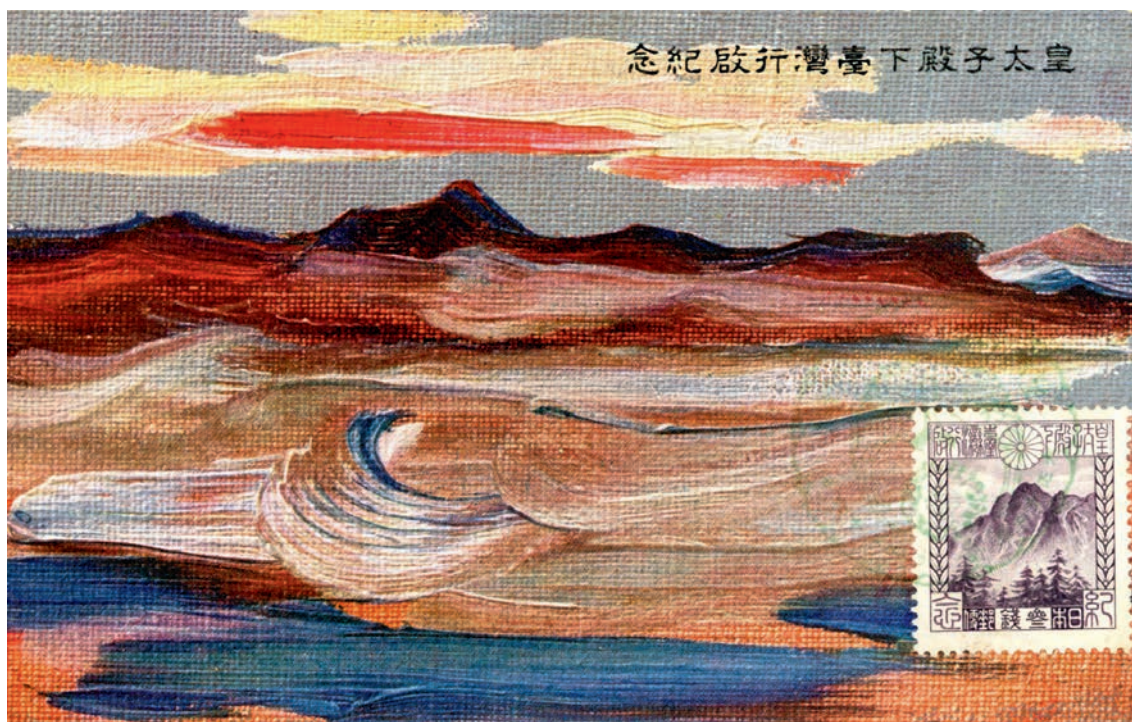
大正8年（1919）日本派遣曾任鐵道局長、總務局總務長官、遞信省遞信大臣的田健治郎（1855-1930，字子勤，號讓山）就任第八任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是台灣首位文官總督，標榜「內台融合」、「一視同仁」、「同化政策」等方針，積極推動地方制度改革，隔年實施州、市、郡、街、庄的官選議會，並在大正10年（1921）設置台灣總督府評議會。他在任內通過日台共學制度、日台通婚制，聘用水利工程師八田與一（1886-1942）修建嘉南大圳，並且邀請當時擔任日本攝政宮的皇太子裕仁親王（1901-1989，1925年即位為昭和天皇）來台巡視。

裕仁親王於大正1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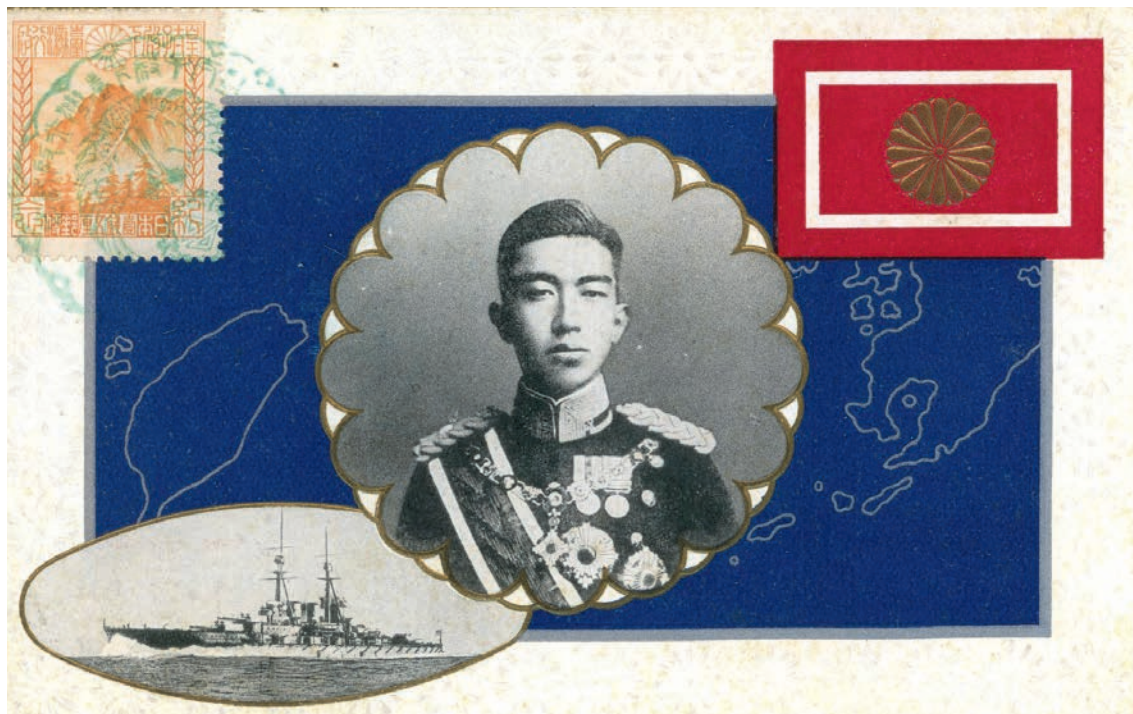
（1923）4月12日從橫須賀軍港出發，4月16日抵達台灣東北角三貂嶺後從基隆港登陸，台灣總督府特別打造台鐵花車做為裕仁親王的陸路長程交通工具；巡視基隆、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屏東、澎湖等地後，於4月27日踏上返程，5月1日抵達橫須賀軍港，總計在台灣停留十二天，昭示「率土之濱，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政治宣揚目的。裕仁親王台灣行啟的紀念寫真帖（攝影集）總計有九冊之多，分別是《皇太子殿下臺灣行啟紀念寫真帖》、《東宮殿下行啟實記》、《皇太子殿下臺灣行啟寫真帖》、《東宮殿下奉迎紀念寫真帖（臺東廳）》、《東宮殿下奉迎紀念寫真帖（花蓮港廳）》、《行啟記



石川寅治1920年接受台灣總督府委託，為新完工的總督府會議室繪製壁畫〈日出〉、〈夕陽〉，爾後配合「皇太子殿下臺灣行啟紀念」系列明信片的發行，採用線描加上水彩繪製台灣竹筏主題明信片，展現台灣風和日麗的悠閒景致。（圖版提供：林磐鋒）



鹽月桃甫1922年從九州宮崎前來台灣，任教於台北州立台北第一中學校（現台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台灣總督府台北高等學校（現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配合「皇太子殿下臺灣行啟紀念」系列明信片的發行，以粗獷的油彩筆調繪製新高山主題明信片，展現氣象萬千的山岳氣勢。（圖版提供：林磐鋒）



配合「皇太子殿下臺灣行啟紀念」系列明信片的發行，此枚明信片以裕仁親王的玉照為主，右上方為日本皇室的紅底16葉8重表菊紋皇太子旗，左下方為裕仁親王台灣行啟搭乘的金剛艦，左上角則是配合其來台所發行的1錢5厘黃丹色紀念郵票，以16葉8重表菊紋加上新高山與台灣紅檜木為主題，搭配篆體字「皇太子殿下臺灣行啟紀念」。(圖版提供：林磐盛)

念寫真帖》、《皇太子殿下行啟紀念帖》、《高雄州行啟紀念寫真帖》等，透過完整影像記錄裕仁親王在台巡視殖民統治政務、教育、產業、民情的成果。

配合裕仁親王台灣行啟所印行的《大正十二年四月皇太子殿下行啟紀念繪葉書》總計有三枚紀念明信片，其中一枚以裕仁親王的玉照為主，右上方為日本皇室的紅底十六葉八重表菊紋皇太子旗，左下方為裕仁親王台灣行啟搭乘的金剛艦，左上角則是配合其來台所發行的紀念郵票，以十六葉八重表菊紋加上新高山（玉山）與台灣紅檜木為主題，搭配篆體字「皇太子殿下臺灣行啟紀念」；另外則是石川寅治（1875-1964）以線描加上水



配合裕仁親王來台所發行的「皇太子殿下臺灣行啟紀念」郵票，繪圖者為樋畑雪湖，圖案以16葉8重表菊紋、新高山主峰及台灣紅檜木為主。2枚1套，分別是1錢5厘黃丹色郵票和3錢紫色郵票，僅在台灣發售。全張80枚，票幅2.6×2.3cm，採用凹版印刷，雕版師為森本茂雄，總發行量約30萬枚。(圖版提供：林磐盛)

彩繪製的台灣竹筏主題明信片，以及鹽月桃甫（1885-1954）以粗獷油彩繪製的新高山主題明信片，展現兩人迥異其趣的筆調。

該繪葉書的封套以紫色反白的椰子樹剪影象徵台灣南國的風物，搭配燙金的菊之御紋，整體簡約素雅又深具南國風味。

日治時期政治面向的台灣設計包括上述宣示主權疆域的地圖、建立系統規範的服制、展現統治權力的皇太子台灣行啟，以及對外昭示政治治理成果的官報、報告書、統計等官方出版品。這些具有強烈政治意圖的設計產物，不管是有無達成設計的功能性，或是開創形式風格的藝術性問題，更加值得深入探討的是其做為頂層階級設計的政治意圖與藝術設計的互動關係。●●